

中原时评

■个论

希望两会更多一些“猛料”

崔永元又来了,这一次他将带来一个有关防止滥种转基因作物、对其加强监管的提案。为了这份提案,他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,从去年10月开始,花了6个多月时间,到美日等国和国内各地调研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泛滥问题。崔永元还透露,在两会上会放出更多“猛料”。(3月3日《南方日报》)

还记得著名的“染色花生”试验吗?在去年3月6日全国人大浙江团小组审议的讨论中,全国人大代表、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打开包,拿出了一袋花生米。朱张金数了10颗,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,用冷水一冲,短短几秒钟,整杯水都变成了黑色。朱张金讲,这就是一些酒店宾馆里售价高达160元一斤的所谓健康黑皮花生。一场关于食品安全的激烈讨论就此展开。

朱张金代表所做的“染色花生”试验,就是一则不折不扣的“猛料”。这一“猛料”在会场内外引起了热议,由此引发的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持续了相当长时间。两会是关注国计民生的地方,只要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,对民生幸

福有益,两会就应该不避热点、关注焦点,就没有不可以讨论的话题。在两会上放“猛料”,符合两会精神,体现两会质量。

希望两会更多一些“猛料”。但必须看到,两会是很严肃的政治场合,而且会期有限、议题无限,需要关注、值得关注的內容很多。这决定了两会应该而且可以更多一些“猛料”,但“猛料”必须言之有据有理,必须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,不能成为“草料”、“毒料”。

“猛料”不是“草料”,不是草率之言,不经调查发言。“猛料”有没有价值,很重要的一点就看是否“捧着一颗心来”,事前有没有下一番细致功夫。转基因是一个很严肃的科

学话题,对转基因的讨论,必须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。崔永元虽非专业人士,但他值得称道的地方,就是独立进行了田园式调查,表现出了重调查、摆事实、讲道理的作风。“染色花生”试验之所以受到肯定,也正是因为朱张金代表事先做了大量功夫。这样的“猛料”才有关关注价值,一旦流于哗众取宠,徒浪费自己和

他人时间。

“猛料”不是“毒料”,不能罔顾事实,不能假公济私。“猛料”能不能服人,很重要的一点就看是否“不带半根草去”,有没有一颗公心。两会是很神圣的平台,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很多,不能被私利牵扯了精力。往年一些议题看起来很生猛,但透露着狭隘的利己主义,有着很强的自利动机,最终成为了口水话题,背离了两会的精神和价值。代表委员在两会上,代表的绝不仅仅是自己,如果只为自己所在阶层谋求利益,那就是把全国“两会”当成了行业协会年会。现在,关于转基因的讨论很热,转基因已经成了公共话题,自然可以成为两会议题。只要抱以公心、不夹带私利,再猛都值得嘉许,越猛越有价值。

希望两会更多一些有据有理的“猛料”。“据”就是言之有据,经过充分调研;“理”就是言之有理,符合公共利益。在转基因上,崔永元已经做了很多猛料,只要有据有理,放再多的猛料都值得肯定,都值得期待。□毛建国

■街谈

鼓励变革先应允许“例外”

做了多年全国政协常委,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是历年全国两会上的热点人物。3月2日,葛剑雄、顾也力、徐安碧三位委员聊起了朱清时,聊起了南科大的成败。葛剑雄表示:“在体制没改变之前,去行政化不能彻底实现。我跟朱先生讲,你不要行政级别,连买个车都麻烦,买多大排量的?开会坐在哪里?为了这个事深圳市政府还专门跟他开了个会,还不如给你个级别算了,每次都要讨论,很麻烦。”(3月3日《燕赵都市报》)

时至今日,南科大的故事,越发变得脉络清晰起来。从最初的迷惘,到其后的惊艳奋进,直至最终复归平庸,再次前途未卜。在这堪称跌宕起伏的剧情中,朱清时一直扮演着“关键先生”的角色。被各界寄予厚望的他,而今或许已被证明不堪其重。从前的豪言壮语,在一再的妥协与退步中,早已渐次消散、难圆其说。就这样不经意间,朱清时已从一位“先行者”,转变成被业界和学界剖解的“案例”。在葛剑雄等委员们看来,其办学行为与“行政化”的纠葛,尤待厘清。

标榜“去行政化”的南科大,终究也不能免俗地有了级别、待遇等世俗名分。按照葛剑雄的说法,这似乎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让步,是大势所趋的必然选择?“不要行政级别,连买车都麻烦”——诚哉斯言!须知,公共资源的分配,在行政序列内部,一贯有着可观的慷慨和效率。一旦游离其外,

便完全是另一种境遇!朱清时渴望“特立独行”,最后也“泯然众人”,想必也是因为,感受到了其间寸步难行的强大阻力。

以“级别”安排为核心的行政化,不仅是一种科层制下的组织架构,更是资源配置的起点,也是鉴定“内外有别”的身份标签。惟有融入既有游戏规则中,才能最大可能为自己争取利益。说到底,无论是南科大,还是其他教改试验,若想在体制外另起炉灶,都注定困难重重。既然如此,一个折中的方案当然是,遵循“传统”继而谋求足够的灵活变通,仅此而已!不一样的南科大,正一步步回归“传统”之内,算是尝试失败还是学会面对现实?

在强大的体制惯性面前,任何“例外主义”都注定羸弱。作为教育界的感言者,葛剑雄尚且“给个级别算了”,足可见行政级别何其重要。从实用角度说,“行政级别”是一切改革者的通行证。且获得越高的级别,便拥有越高的能量,也就有了更多便宜行事的空间和可能……但问题在于,所谓“变革”理应有理想色彩,若总是本着“实用”思维行事,未免显得太过中庸和投机。事实上,之于教改,尤其需要焕然一新的局面。

“不要行政级别,连买车都麻烦”,其实麻烦的何止是,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呢。回归行政序列,固然能换取一时方便,可多多少少要丢弃初衷,当真是两难抉择了。□然玉

■个论

代表本就应“压力山大”

3月3日的《新京报》“人大观察”栏目发表全国人大内司委内务室朱恒顺的文章称,2日,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开始报到。在报到现场,我与一位连任三届的代表交谈时,他颇有感慨地说,今年出席人大会议时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压力感,简直是“压力山大”。而从平时接触来看,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,特别是人大制度完善步伐的加快,感觉“压力山大”的代表越来越多。

我们记忆犹新的,是每年的两会,总有一些代表委员的建议和发言令百姓很是失望、不解甚至是惊愕——因为有的是在说套话、假话、空话,不知所云;有的是在朗读政府工作报告等会议材料、毫无见地;有的则是站在自己小团体、利益集团的立场,说些“响彻云霄”的“雷人雷语”或者是庙堂豪语;有的发言,则被抨击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民的网文。凡此种种,实在是愧于人大代表、政协

委员的称号。

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职责是要行使好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的神圣权利,这是人民赋予的权力,当然是得“压力山大”的。而一些代表委员之所以令人吐槽、灰心,显然是与平时的履职不力密切相关,与平时的调查研究、倾听民意不力密切相关——一个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,只有在平时的300多天里与百姓打成一片,怀着情感去了解百姓的疾苦,倾听百姓的心声,只有在做足了功课的前提下,他的议案和提案,他的建议和发言,才能围绕民生热点、难点,接地气、说真话,名副其实地为人民代言、疾呼,反之,肯定是要被百姓嗤之以鼻的。

正如一位代表所言,现在,选民和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寄予的期望越来越高,社会各界对人大代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,以前,开会时一般只是参加审议发言,参与提出议案建议,甚至不发言不提建议也没什么。现在,社会关注的不仅仅是你是否参加会议,是否发

言,更关注你在会上讲了什么,讲的是不是民众关心的问题,民众的呼声和建议有没有带上会议;不仅要积极提出议案建议,而且还关注内容及质量;你在监督“一府两院”工作方面是否称职……

就像现在很多当官的都在吐槽“为官不易”了,其实,“为官不易”才是回归正常的状态,否则,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呢;现在,代表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“压力山大”,那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——不然,选民干吗选举你代表人民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?没有压力的代表委员,遑论使命感和责任感,能指望他去为民代言、维护好百姓的权益吗?代表们的“压力山大”,更说明百姓的知情权、监督权也在不断增强,你去会上做“花瓶”、去敷衍,百姓就会群起而吐槽、批评,媒体也会不客气地质疑、诘问——这不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的缩影吗?

□吴杭民

■街谈

防性侵首先要破除“童话教育”误区

3月2日,“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女童保护座谈会”召开。一项调查报告显示,2013年全年被媒体曝光的案件高达125起,平均3天就曝光一起。教师成为曝光最多的犯案群体,达到33起,校长作案10起。3位政协委员建议,落实四部委意见,出台权威的防性侵教育教案。(相关新闻见本报AA04版)

近年来,性侵女童的案件不时进入公众视线。那些无辜的孩子们,一次又一次击中我们心中的爱与痛。在震惊、愤怒、同情之余,每个人都需要去反思:在那些注意力盲点和监督空白点,如何保护女童不受性侵?如何建构一道周密的隔离网和防护墙,让未成年人免于罪恶之手的伤害?

教师也好,校长也罢,性侵女童“熟人作案”的背后,是安全焦虑和风险漠视并存的困境。一方面,不断发生的交通安全事故、意外伤害事故使得老百姓处于焦虑的状态;另一方面,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强,公众对那些突发的、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,而对于那些缓释性的、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。

出台防性侵教育教案的初衷,在于加强性教育和青春期教育,提高女童对性侵害的分辨能力和防范意识。长期以来,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,存在着一种“童话教育”的误区,即告诉孩子们世界的美好和人性的善良,却没有告诉他们人性

也有阴暗的一面、生活也有艰辛的一面、命运也有残酷的一面。防性侵教育的匮乏,让女童在遭遇“人性之恶”之后,徒增“悔之晚矣”的伤痛与悲情。

“童话教育”一方面选择性地告诉学生所谓的“美好”事物,甚至故意夸大美化某些人物,另一方面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,都希望从孩子口中听到“美好”的答案。这样“先入为主”的灌输教育,让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处于被遗忘、被忽视乃至被压抑的状态,难以分辨和抵御不法侵害——女童对性侵害缺乏最基本的分辨能力和防范意识,部分女童在遭到侵害后仍不能辨识事情的性质和后果,甚至不懂如何向家长表达,担心家长会责骂自己。

性侵犯不仅给女童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创伤,还给她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。“孩子,我用什么来保护你”,这样的时代之问,考验着每一个有良知的成年人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,我国的性教育还处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起步阶段;只有不断健全性教育的实施操作系统,不断扩大性教育的社会支持,性教育才会从量变走向质变。

走出“童话教育”的误区,增强女童风险防范意识,提高女童风险应对能力;她们的人生,才会少一些阴霾,多一些光亮。□杨朝清